

中国同龄人

——李世义文论荟萃

世纪之交的思考

中国法学会榆林地区联络组编

共和国同龄人

——李世义文论荟萃

世纪之交的思考

中国法学会榆林地区联络组编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封面设计 贺一涛
解友红
版式设计 李世义
激光照排 赵 文
责任校对 窦小红

世纪之交的思考

中国法学会榆林地区联络组编

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制

850×1168毫米 1/32 9.5印张 8插页 246千字

陕内资图批字(99)EY 28号

定 价:21.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印厂负责调换或赔偿



神安事盛



在“全国
司法改革研讨
会”上大会发
言

(1999年11月
5日北京大学报
告厅)

在陕西
省党校系统
第十三次理
论研讨会上

(1999年9
月22日于咸
阳)



在全省党校系统
第十一次理论研讨会
上大会发言

(1997年于户县)





在“建国50年与陕西跨世纪发展”研讨会上颁奖
省委常委、宣传部张保庆部长(左)与省委党校兰友仁
常务副校长(右)颁奖。(1999年10月10日于西安)

在全省党校系统第十一次理研会领奖台上 (1997年于户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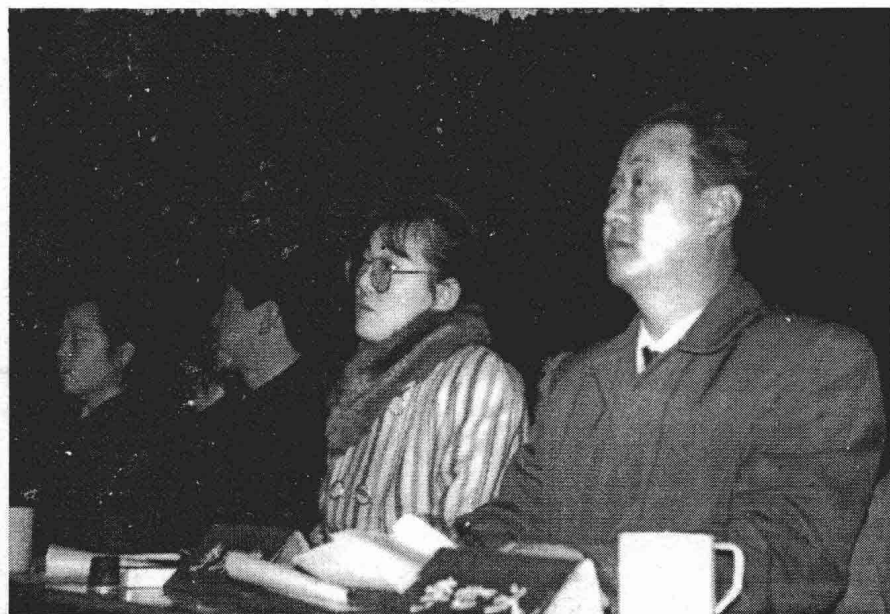


合作作者李稷作大会发言

(1997年6月于西安)



在评委席上 (1993年国庆)



与导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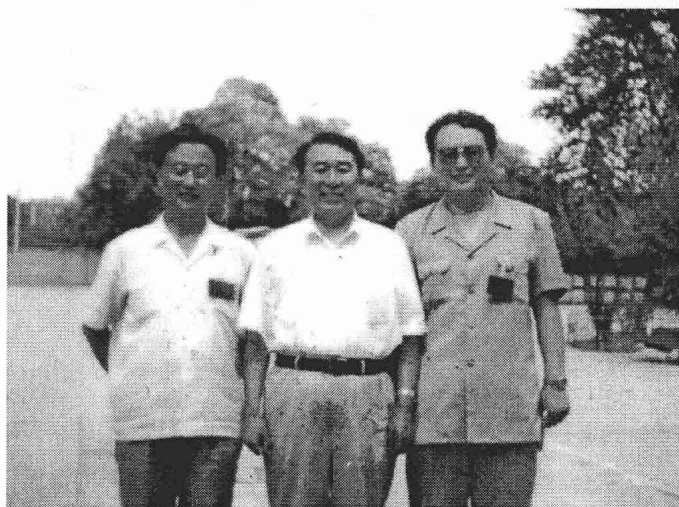
(右：中央党校法学教授
黄子毅，左：中央党校法学教
授刘永桂)

(一九九三年元月于北京)



在陕西省法学
会第三次代表大
会上与省司法厅
厅长、省法学会
会长慕锡明(中)、杨勇同
志(右)合影。

(1994年7月于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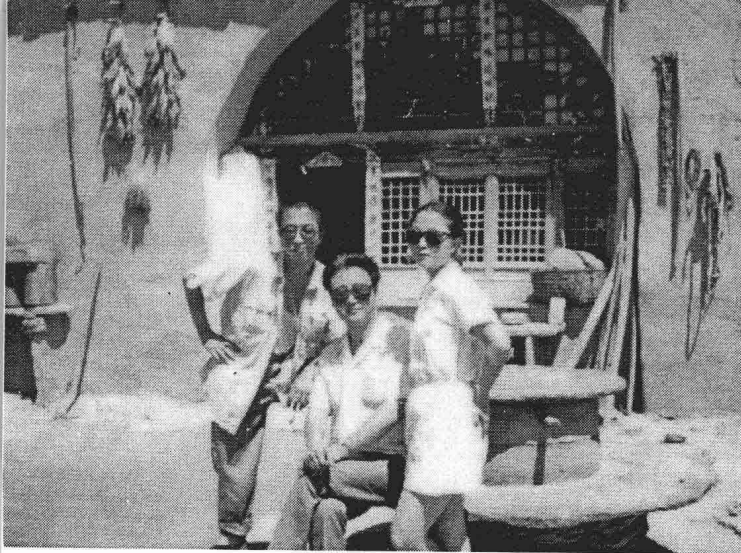


第十三
次
研
会
参
观
礼
泉
县
袁
家
村
时
与
党
支
部
书
记
郭
裕
禄
(左三)合影

(1999年9月2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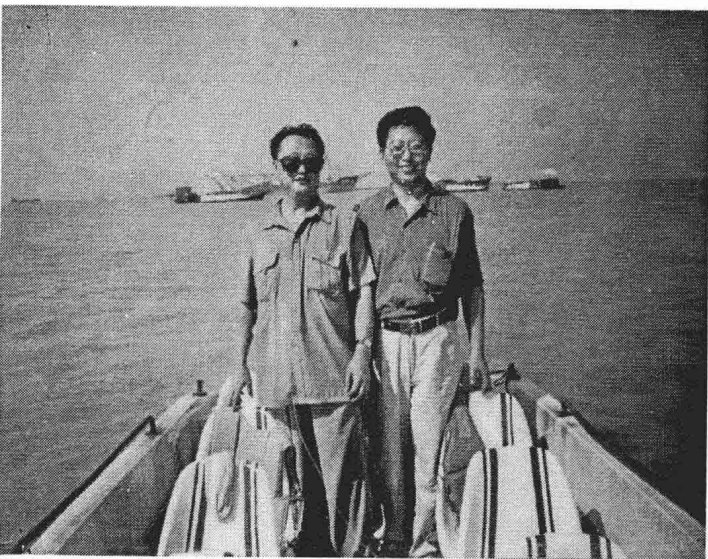


故居情思

(1993 年携
儿女重归故里
留影)

元旦聚会

(1993年元旦于中央党校：作者右边是中央党校法学教授谢邦宇，左边是田云中)



海上休闲

1999 年 8 月
22 日与沧州市委
党校副校长田云
中(右)在渤海游
艇上



与父母在一起(左起:长子李世义,副教授、律师、主编;三子李世宏,高级政工师、律师、副主编;父亲和母亲;次子李世军,副教授、主编;四子李世东,经济师、副经理。1998年夏于榆林家中)



四世同堂

前排: 孙子; 中排: 父亲和母亲; 后排右起: 儿子、妻子、儿媳

(1999年元宵节作者亲摄)

三代同堂

右起: 女儿、女婿、作者、妻子、外孙、儿子
(1996年春节留念)





母子情
(1994)



父子情
右父亲、左大伯父 (1968)



公安一兵
一九七四年

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



毛乌素沙漠考察 (1996.7)

爷孙情
(1999.9.10)



父女情
正月初五
一九九六年



从贫儿到律师、教授

——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人生轨迹

(自序)

《世纪之交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就要面世了,难免引来人们的褒贬。不想隐瞒本来面目,特自序。

这完全是一次不经意的感情冲动——几个老同学聚会,最小的官衔也是副县级,唯我一人还是不入品的酸先生。他(她)们一杯一杯不停地给我敬酒,化解着这种尴尬,数说着自己看到的我发表的文章和编辑出版的书:

——我看到了你关于司法制度改革的文章,切中时弊,很多观点正在改革中变为现实……

——我94年就读过你主编的《市场经济法概论》,对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很有指导意义……

——我看过你一论、再论、三论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与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的系列文章,抓住了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最要害的问题……

——你在《理论导刊》发表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几个问题”与“浅议坚持党的领导与加强人大制度建设的关系”,探索的是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但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你的观点犀利透彻,确实写出了新意……

——我最赏识你的《嫉妒——也是一首歌》,它是富有哲理的人生真谛……

一个曾同过桌的同学,站起来给我斟满一杯酒,自己也端起一

杯，文文静静地说：“毕业后同学都有变化，唯你还是以前的你，秉性一点没改——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敢说心里想说的话。不说你超凡脱俗，但你活得比我这个县团级干部洒脱。我常不喝酒，今天陪你干一杯，建议将你发表的文章编成个小集子，把你这个小人物的大观点宣扬光大。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解决！”其他几个也随声附和。我一仰脖子喝干了杯中的酒，已经醉意朦胧，酒涌心动，拍着胸脯表了态：“好！就凭敢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这句话，我一定将这个集子选编出来，让社会听听共和国同龄人的心声，也算世纪之交对自己人生轨迹的小结……”

第二天酒醒后，听说了我在酒场上的醉态狂言，很有些后悔：已经年过半百，上有老，下有小，疾病也开始纠缠人，还要超负荷完成本职工作任务，选定的立项研究课题也没全部完成，把精力、财力花在整理出版已属“成果”的东西上，值得吗？但从小就养成了牛脾气（本属牛），凡事说了就要做到，岂能失信？回顾自己由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律师、法学副教授走过的风雨历程——清贫洗心，自立革面，勤学奠基，自强立业，嫉妒熔炼，直面人生，开拓进取，神安事盛，我才最后决定把这个集子搞出来。

一九四九年正月初五日，我降生在无定河畔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与共和国同龄，也有与共和国同样的经历。共和国曲折我坎坷，共和国辉煌我辉煌。

我是在清贫中长大的，长大后又经历了清贫。我的童年、少年到步入青年，经历了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特困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全家八口人，主要靠父母亲在农业社劳动挣工分养活，再就是靠政府供应救济。吃过的野菜有十多种，糠窝窝、糝糝饭伴随我长大。当时，全村都穷，但我家又是全村最穷的。村里与我同等年龄的小孩有十几个，都先后退学，唯有我的父母亲受尽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没有使我辍学。从初中到高中，每月5.50元的

助学金，支撑了我的全部费用。参加工作后，33.50元的月薪八年一贯制，维持着四口之家的生计。加之妻子劳累过度三年治病，我又贷款上大学，年年负债。进入90年代，儿女自费上大学，我一人的工资更无奈。直到1997年儿女都成了家，才逐步扭亏为盈。现在被同事戏称为“大律师”、“大教授”的我，生活水平比以前有了显著提高，但与同层次的人相比，我还是一个“贫儿”。但是，清贫洗心，穷困励志，使我始终保持了一颗纯正上进的心。

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和富有的学习生涯。我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雄踞金牌奖坛，再没有让予过别人。一年级就加入少先队，一直担任学习干事和中队学习委员。13岁考入高杰村中学上初中，14岁加入共青团，担任学生会主席。每年都能给父母拿回几张奖状。1965年初中毕业，本是推荐上秘密学校（实际是军工技校）的重点对象，但校长、老师都认为我是上大学的好料，做通了父母亲的工作，考到了清涧中学上高中，担任学生会生活部长。一场文化大革命，大学停止招生，直到1982年考入省委党校大专理论培训班，才圆了我的大学梦。又自学法律，参加自考获法律大专学历，奠定了专业基础。在教授法学课的过程中，先后读完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本科和政法本科两个专业的课程，获双本科学历。总觉得自己掌握的知识太少太少，头脑太空洞太贫乏，所以有一股使不完的劲，时至今日还天天熬夜读书学习，充实自己，从未间断。

祖祖辈辈是受苦人，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穷人翻了身，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类似我家这样原来无地无房的贫下中农最沾光，我从小就最拥护毛主席共产党。但看到父亲当着生产队长，起早摸黑拼命干，却过着吃糠咽菜的光景，幼小的心灵就涌动着自强自立、跳出“农门”的强烈愿望。但一场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我的初衷。

文革初期，就因我是学生会干部，与学校的“走资派”、教师中的“牛鬼蛇神”“划不清界限”，一块关押劳动一个月。红卫兵大串连开始后我才造反上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武斗开始后，我又被造反派

抓在“群专会”关押一个多月，坐过“直升飞机”，享受过“老虎带串铃”的待遇。因为痴迷不悟、冥顽不化，被造反派开除团籍、学籍，迁送回农村。初涉社会的我，心存无数个迷茫，为什么好人、有本事的人总是挨整？决心安安稳稳当农民，即时结婚成了家。

农村劳动半年，就去当民工修东风水电站。工地上干了三天，就升任连队会计。村里小学要新开五年级，公社革委会三次派人硬把我抽回当民教。五年级刚毕业，就被调到刘家山中学。开学刚教两个月，又被县农行直接选录当了接替员（1970年），分在高杰村营业所，先搞农贷工作，后搞会计。这期间，公社党委二次抽我应急蹲点，稳住了袁家沟、高家坨两个复杂大队的局面。1972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4年县革委会领导下来检查蹲点工作，无意中发现了，被县委、县革委会评为模范蹲点干部，表彰大会召开7天后，出文调县公安局搞刑侦工作。报到的那天，天下着雪，铺盖卷也没来得及打开，就上车出发参加了诈骗大案的侦破工作……

当一名公安侦探，是我从小的志向，外祖父是我的第一启蒙老师。外祖父是方圆左村右邻的文化人，有好多好多古书。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钻进了这些古书堆，看了《水浒》、《说岳全传》、《杨家将》、《三国演义》、《薛仁贵征东》等等，但最让我爱不释手的是《肖像全图包公奇案》，反反复复不知看了多少遍。包公刚直不阿、不畏权势的气节和秉公执法、断案如神的才干深深印在我幼小的心灵，成了我崇拜的第一个偶像。外祖父也常提些怪怪的问题考我，说我长大能当包文拯。现在我真正成了公安一兵，决心要做当代包公。我刻苦钻研业务，破案工作再累也坚持学习。我学习掌握了步法追踪技术，并担任教练。在6年的公安生涯中，参与侦破了不少案件，凡由我负责的，没有存下死案。但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法制不健全，党委领导一切，包括具体案件的审批决定，不可思议的事情经常会遇到。为有的案子我也曾拍案抗争过，但领导的话就是法，只能服从。想当包公的我茫然了，初步意识到了个人的无奈，

开始朦朦胧胧地思考，这是为什么？

1979年恢复县级党校建制，要配备理论教员，我再一次被县委选调到这个岗位。还没报到，正请假在家收秋，却被新单位几次电话召回城为干部轮训班讲课。从此，开始了我的理论工作生涯。但这时候的我，对理论还处于盲点，只是学习政策、宣传政策。我不愿放弃法律，1981年，考上了兼职律师工作者。

1982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久病的妻子治愈，一女一儿都上了学，父亲最体谅我想上大学的心情，一口揽承为我种口粮地，我摆脱各种羁绊，考取了省委党校马列主义理论大专培训班。带着工作中的迷茫和对社会的思考，花着从信用社贷来的“短缺”经费，我更加珍惜一分一秒的时间。除认真聆听老师的讲授、完成作业、参加讨论，另外自学阅读了上百本山沟沟里根本就找不到的书。倍感枯竭的我不满足于本专业所设课程，还穿插旁听了西北政法学院的法律课程，参加了中文刊授学习。系统的理论学习，法律知识的补充，文学修养的提高，使我得到全面升华，开始自觉地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我的毕业论文——《浅议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必然性》，用13000字的篇幅，全面系统地探索总结了农村改革的新鲜经验，被评为优秀论文，并选为国庆节的展览作品。这是我的第一篇成功的理论文章，初试锋芒跨进了理论研究的殿堂。

1984年7月我拿到了第一个大专毕业证书。7月1日，我首次登上了西岳华山，放眼天地人间，大河腾细浪，群山走泥丸。即景生情，脱口吟出：

世盛者，一生搏进；

义愤者，永远年轻；

自知者，扬长克短；

勉勤者，勇于登攀。

这四句话，也是我毕业纪念册上的箴言，并印在我的第一本专著

《法律教学研究与释疑》插页，成了激励我拼搏奋进的座右铭。毕业后，我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是负责常委学习的理论干事。这一年我转了干，省司法厅考核批准转为正式兼职律师；跨进了知识分子队伍，开始领取山区补贴；解决了家属的农转非，妻子儿女跳出了“农门”；地委宣传部、地委党校、地区司法局同时选调我，有了选择职业的机会。最后我所以选择了地委党校，原因有二：一是地委党校被批准为大专体制，调我教法律课，能发挥我的优势——理论奠基，法律立业，教学探索，律师实践，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二是只有地委党校承诺即时解决我的全部实际困难——家属住房、儿女转学、妻子工作和兼职律师办案的矛盾。

1985年调进地委党校至1991年，主要精力搞了教学改革。我不是法律科班出身，只能边学边教、教学相长。面对党校教育存在的不适应与党校学员和法律自身的特点，我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实施了“六字”教学法，对法学课教学进行了全面改革。这场改革给学校带来了生气，也引起个别人的非议与刁难。但是，学校领导与教务处支持了这场改革，使之没有夭折。当时风气还正，考评教师教学效果主要是通过学员评议打分看实绩，每月都召开民主生活会，教职工可以面对面地畅所欲言，不存在个别领导“暗箱操作”。所以我在毫无意识也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1年，我总结了这一段的的教学理论探索和教学改革实践，编著出版了《法律教学研究与释疑》一书，正值地直工委与学校党总支开展“为党旗增光彩，向‘七·一’献厚礼”百日竞赛活动之际，敬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七十周年。随着教学体制的转变，走读与函授成了党校教育的主要形式，我将工作重心也调整到科研上来。

1992年是我人生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10月18日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目标后，中央党校做出最快反映，于11月2日至1993年元月举办了“市场经